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年，xxi，440頁。

在近年來引人矚目的臺灣史研究中，越來越多不同學科背景及理論立場的學者，以其獨特的研究視野與問題意識，提供了意趣迥異而富啟發性的解釋框架，極大地推動了臺灣史尤其是清代臺灣研究的深入發展。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柯志明2001年出版的《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就是其中值得重視的一部社會史論著。

作者循清代臺灣熟番地權性質及其變化原因這一瞭解和詮釋臺灣社會變遷的關鍵問題入手，通過對文獻資料和經驗證據進行重要而卓有成效的重新整理還原工作，力圖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審視清代臺灣歷史上出現的各種熟番地權及其演變過程，對其中的因果機制在理論上進行解釋，從而發展出「族群政治」這一新的研究視角作為探討清代臺灣歷史的一種「替代性」（alternative）理論。

整個清代的臺灣，漢人移民、熟番（平埔族）、生番（高山族）和清廷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之一。而由漢人移民的墾殖所必然帶來的漢人與熟番之間的土地權利關係，以及清朝廷對這種關係的介入，則構成了認識清代臺灣族群關係及其演變的一個重要方面。作者以「番頭家」為書名，正反映了對有「頭家」稱謂的平埔族土地業主，以及圍繞土地權利而展現的番漢關係的核心關切；為了闡釋族群政治是造成熟番地權制度演變的主因的觀點，作者大量發掘和運用了各種官私文獻，重新對清代臺灣出現過的各種番租類型及其演變過程，進行了細密而出色的梳理工作，並在此基礎上通過與既有理論觀點的對話而推演出新的解釋框架。這在該書的章節安排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者將全書結構分為歷史敘事與理論爭辯兩部份，第一部份各章依次為「族群政治」、「清初封禁下的番漢地權安排」、「熟番地的開墾與官方的介入」、「地稅改革與番地開禁」、「熟番暴動與番地的再封禁」、「族群結盟策略與三層制族群分布制度」、「熟番地保護的落實」、「三層制族群分布制度的危機與重構」，基本上是按照時間順序，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臺灣的族群政策變遷過程進行了仔細梳理，並對不同歷史時期的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關係展開了初步討論。頗具意義的，不是作者試圖通過對「三層制族群分布構架」的強調，來重新審視和探討清乾隆中期臺灣的族群政治與番政變革，而是由此出發，對乾隆中期熟番地權變革的定位（即以「重新配置」沿邊土地為主要目的）及其背後驅動

機制的梳理，這就是，「乾隆中期以後確立的『番大租』，其意義在於，清廷透過重新界定特定地帶的地權，給予特定團體（熟番）差別待遇，以創造出額外的地租，作為該團體為政府服務——守隘——的報酬。」（頁27），可見，作者是將「三層制族群分布制度」，視為番大租製造成熟番地重新配置及加強保護的背後驅力，應該說這是作者對臺灣社會在特定時空條件下運作機制的深刻洞察與獨到見解。尤其是在第八章，作者利用淡新檔案中極為重要的相關官方公文，以及民間私藏的岸裡社古文書等珍貴文獻，對熟番地保護的政策與措施落實進行的詳盡而卓有見地的討論，非常有說服力地向讀者呈現了熟番地保護背後的制度性安排的過程和細節。

第二部份則通過對熟番地權的分類與演變、番租的保護與分布、「熟番地權演化」等各章，對相關問題側重點不同的討論，在與既存理論充份對話的前提下，鋪陳出作者歷史制度論分析的結論——族群政治是造成清代臺灣熟番地權制度變化的主要因素。在與日本舊慣調查會、邵式柏（John Robert Shepherd）和施添福的理論爭辯中，作者對其依據的文獻資料與經驗證據進行了重新的檢閱和評價，直接動搖了「國家剝削論」和「理性國家說」的立論基礎，認為「經驗事實與國家剝削論所認定的平埔族因不堪壓榨而『流離失所』並不相符，同時也拒斥了理性國家說裡清廷藉由『順應』平埔族對原領地的土地權利主張而得以維持『族群安定現狀』、遂性『低成本統治』的說法。」（封面折頁）為了建構一個作者認為更加合理的解釋框架，作者在對資料的重新解讀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比如在第十一章「番租的保護與分布」中，就通過利用土地申告書與淡新檔案地籍資料，重新釐清番租數額與分布，從而透過熟番地座落地帶的考量，對清廷保護熟番地政策及實效作出了具說服力的解釋。事實上，作者的這一研究意趣和學術努力貫穿了全書，包括作者對地圖、示意圖及表格的恰到好處的運用，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者在觀察、研究與寫作方面值得肯定的創新追求。

在該書建構的「三層制族群分布構架」中，熟番、生番、漢人是作者所核心關切的三個不同人群。不過，在文本的敘述中，它們似乎是相當明確的社會群體。正如作者所認識到並強調指出的，其族群政治理論中的「族群」特別是被名之以「熟番」的這一族群，是「因清廷的政治目的而被建構出來的」，「是因為清廷在制度（特別是地權制度）上建立與漢人族群的差別待遇，而被區劃出來的特定社會類屬」（頁366）；那麼，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制度變更及習慣政策實施過程中，以及在空間分布上不斷變化的情況下，這些人群構成仍然那麼確定無疑嗎？這是一個相當複

雜的問題。我們可以同意作者的一個基本判斷——「熟番地權制度的形成與轉變，除了反映出清廷臺灣統治的特定關切外，同時也是清廷與番漢族群互動的結果，也就是族群政治的結果」（頁377），我們也理解作者對在番漢互動關係（特別是土地權利關係為核心的番漢經濟關係）下可能帶來的對「番」這一弱勢族群所必然造成的嚴重後果的認識。但是，或者囿於資料的匱缺，我們未能見到對三個不同族群對於來自清廷的制度性介入而作出的能動回應的充份描述：在國家與族群不同階段的互動過程中，熟番如何反應？生番如何反應？被界定為漢人的這一族群又採取了怎樣的策略？而作為動態關係中界線較為模糊的熟番、生番、漢人之間，也給分辨土地權屬問題帶來了不少困難。比如，作者認為直到康熙朝在荒地與番地之間並不存在清晰的區辨（頁85），那麼，又怎麼可以將漢人所開墾之番地徑直等同於熟番地呢？作者認為是造成番地流失的贖社制，到了乾隆二年亦仍然適用於界外歸化輸餉的生番（頁93註腳10）；而在述及林爽文反叛事件時，官員有林爽文「勾結生番往來捻熟」的認識，同時官府在鎮壓事件過程中也有動員和武裝生番、熟番之舉（頁251-253）；即使是因番租類型資料完整豐富而被作者引為分析案例的岸裡社，也是一個「歸化較晚」的番社，敘述中岸裡社作為「歸化生番」或是「熟番」被指稱，有無實質上的區別呢？（頁303-306）是以作者精心構建的「三層制族群分布構架」仍有需要推敲和完善的地方。就此而論，儘管作者對文獻資料和經驗證據進行了重要而卓有成效的重新整理還原工作，力圖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審視臺灣歷史過程上出現的各種番租類型及其演變過程，對其中的因果機制在理論上進行解釋；但在建立一個由下往上看理論視角，動態地看待這些不同歷史時期在臺灣社會歷史舞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不同社會人群及其互動關係，從而達致對臺灣入清以來整體歷史的把握等方面，還是留下了一些可以展開進一步工作的空間。

張應強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莊孔韶等，《時空穿行——中國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7，1，496頁。

《時空穿行——中國鄉村人類學世紀回訪》一書是由莊孔韶等9位中國人類學界學者共同撰著的一部關於20世紀中國鄉村社會人類學研究的接續性